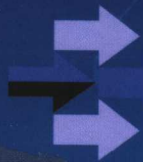




# 亚洲学



# 回归亚洲

——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论文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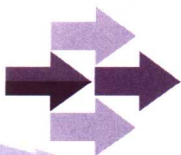
王荣华 黄仁伟·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亚洲学



回归亚洲

——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论文综述

王荣华 黄仁伟·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学回归亚洲: 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论文集/王  
荣华, 黄仁伟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ISBN 7-80681-939-8

I. 亚... II. ①王... ②黄... III. ①亚洲-研究-文集  
②政治-亚洲-文集 IV. K30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9834 号

## 亚洲学回归亚洲

——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论文综述

主 编: 王荣华 黄仁伟

责任编辑: 张晓栋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宝山杨中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1-939-8/D·093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由荷兰(莱登)国际亚洲研究院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CAS4)于2005年8月在上海举行。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由荷兰(莱登)国际亚洲研究院发起并主办,是旨在促进全球亚洲研究的系列国际论坛。首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CAS1)在荷兰举行,第二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CAS2)在德国举行,第三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CAS3)在新加坡举行。按计划,第五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CAS5)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

长期以来,“亚洲学”在西方国家起源并受其话语主导,也大多反映西方视角、西方价值观及西方风格,亚洲研究的交流平台也多在欧美发达国家而不在亚洲。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迅速崛起,亚洲重新焕发出活力和文明的光彩,世界关注的焦点再度转到了亚洲这块古老的大陆。从第三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ICAS3)起,连续三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在亚洲举行,象征着“亚洲学回归亚洲”。

“亚洲学回归亚洲”不仅体现在有关亚洲研究的大型国际学术交流连续在亚洲举行,更表现在亚洲学者的广泛参与,亚洲人就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生活等诸多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学者开始与欧美及其他地区的学者真正平等地交流思想,交换意见,探讨问题。可见,亚洲人正在掌握亚洲研究的话语

权。出席本届亚洲研究学者大会外国学者共计 830 余人，其中亚洲学者超过半数，这也是“亚洲学回归亚洲”的例证之一。

亚洲学回归亚洲的意义还在于，通过生活在亚洲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亚洲人的积极参与和特殊贡献，国际学术界亚洲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学术流派更加多元化，学术风格将更加多样，思想火花将更加绚丽多彩。事实确也如此，本届大会论文充分展现了这样一种思想活跃、观点多样、新意纷呈的盛况，应当说是亚洲学的一次学术丰收。正因如此，本届大会承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大会论文摘要和概述按不同学科领域进行整理，以便把一批颇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奉献给关注亚洲发展和对亚洲学感兴趣的读者。当然，本书所收集论文摘要所表达或介绍的观点都出自论文作者本人，并不代表本书编者的看法，读者自可见智见仁。

参加本书论文整理和综述工作的有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屠启宇、张家哲、王海良、林琳、马军、刘柳、包蕾萍、杨昕、刘阿明、李元等学者。王海良进行了统稿，上海社会科学院部分学者和研究生对论文收集、翻译等做出了贡献。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编者还要诚挚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同仁们，他们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很高的效率，仅用非常短的时间，就把这本集子奉献给广大读者。

**编者**  
**2006 年 8 月**

# 目 录

前言 .....	1
国际关系、区域主义及亚洲政治综述 .....	1
经济、环境综述 .....	28
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综合研究综述 .....	58
社会学、人类学综述 .....	103
历史综述 .....	131
宗教综述 .....	157
传媒综述 .....	178
文化综述 .....	189

# 国际关系、区域主义及亚洲政治综述

## 一、多边—区域主义

### 1. 区域主义与亚欧事务

国际关系中的两极体制结束以来,国际体制的变革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来自欧洲、北美和南美的学者研讨了跨区域合作对国家行为体行为的作用。他们想知道,亚欧事物及其包含多地区行为体的国际体系固有模式是否构成一个新的多地区世界秩序的轮廓? 欧盟、亚洲、印度和美洲国家的角色是什么?

英国学者 Michael Postert 在题为《作为通向亚洲大门的欧亚会议,欧盟式的经济融合?》的论文中提出,亚洲地区的金融架构是竞争的政治日程的基石,一方面融入国际货币基金全球体系,另一方面保持一个比较自主的亚洲体制,联系和服从都比较松散。他认为,近年来,由于欧盟货币一体化愈益成功,亚洲出现了一种更平衡和自信的货币和经济政策方式。透过“全球政治”方式可以看出,地区间合作的进程是如何导致经济和金融一体化领域更加自主的政策方式的。通过与欧盟及其他关键行为体的互动,东北亚进一步形成了其一体化的轮廓。

加拿大学者 Marc Lanteigne 在题为《亚欧会议与中国—欧盟关系》的论文中提出,过去 10 年中,欧盟在中国外交政策中起的作用更大了,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战略领域。但他也

指出,这两个行为体之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才能创造更牢固的跨地区纽带。同样,欧盟的多面性质以及它制定统一外交政策的尝试,将成为对北京“周边”外交的另一种检验。

墨西哥学者 Marisela Connelly 在题为《中国与拉美的关系》的论文中指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接触更加频繁,尤其是在 2004 年。双边贸易额骤增,经济合作发展。不过,双方出口产品一致,在对美国出口方面竞争超过合作。中国外交意在消除这种担心。此外中国对拉美外交重视台湾问题,因为台湾与 14 个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有所谓的外交关系。

德国学者 Christian Wagner 在题为《印度对区域内和区域间政策的新追求》的论文中提出,在目前关于扩大亚洲区域合作和欧亚之间跨区域主义的日益增长的政治重要性的争论中,印度和南亚只扮演边缘角色。印度在这一进程中的边缘地位,原因在于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该国的外交政策,当时南亚的区域协作尚在初期阶段,经济改革也处于萌芽状态。他认为,到 1991 年以后,印度参与区域组织的兴趣才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焦点。印度正在印度洋积极建立区域组织,与欧盟对话,并即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也很可能成为今年 12 月亚洲峰会的参加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翟昆在题为《软力量:亚欧关系中的新合作项度》的论文中提出,亚欧关系正面临巨大挑战,这就是如何向纵深推进。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时代,双方都应开发和形成一种新视角。他认为,双方之间在软力量领域合作是正确方向。首先,双方应有共识,未来国际结构将由两个趋势建构起来,大国之间的合作与亚欧会议的特殊作用。其次,双方可以交流危机管理和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三,形成“亚欧共识”。

中国同济大学郭学堂在题为《欧盟在亚洲事务中作用日增:现状与前景》的论文中指出,亚欧会议和中-欧战略合作的扩大,



在伊朗核争端问题上与美国和 IAEA 的协调,在中亚国家的政治卷入等意味着,欧盟可以在亚洲事务中建设性地使用硬力量和软力量。他认为,欧盟和亚洲都有一种新理念,它展现了一个全球合作的前景、没有民族主导的共同安全和没有压迫及传统帝国主义的多边安排。但欧盟和亚洲国家还要设法找到避免双边争端的合作领域,欧盟还要在亚洲安全 and 经济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意大利学者 Davide Quadrio 在题为《亚洲和欧洲:开辟一种新战略》的论文中提出,欧洲大陆虽有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却在整体上拥有比亚洲更大的统一感。亚洲辽阔的幅员本身就是形成网络的巨大障碍,更无须说政治、经济差异了。一种理想和中性解决办法是建立基于金融和实际支持的基础。他认为,亚洲没有大的交流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欧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个别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可能为其艺术家提供交流资金和交流机会,但整个亚洲缺乏交流基金。

## 2. 东盟的影响

东盟已经成为推动地区合作的主要舞台,“东盟+3”架构最好地展示了这一点。与会代表把东盟当作一个参照点,虽然讨论它的不同方面,但都对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双边和国家制度角度认识东盟一体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感兴趣。

日本学者 Paul Close 的论文探讨了亚洲超国家区域体制(EASRR)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以及超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别调节这一关系的方式。他认为,通过“东盟+3”合作的力量,基本的或萌芽的亚洲超国家区域体制得以存在。区域一体化,围绕“东盟+3”的区域融合进程,将反映全世界超国家主义日益增长的感召力。超国家主义是一种西方文化特色,正在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席卷全球,其根源主要在欧洲。向超国家区域体制的推进受到“本土”民族主义运动的抵制,特别在东北亚,因

而可能被阻碍。但他认为,它不会被终止。相反,它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占上风,因为有权力精英致力于超国家主义,尤其是在“本土”和区域层面。

日本学者 Aysun Uyar 在题为《日本和中国对东盟的经济方针》的论文中提出,近年来,东盟已经成为东南亚经济活力的主要推动力量,作为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领袖,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领导地位正在下降,中国利用其最大市场的地位,建立了与东盟经济融合的功能性机制。尽管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融合是很近的事情,但学术界普遍在议论中国一直在东南亚起经济领头羊作用。但他坚持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长期取代日本充当东南亚的经济领袖。在分析日中在东盟市场的经济潜力时,还应考虑到中国经济繁荣与国内潜在危机并存,中国在南中国海有长远的地缘战略利益。

越南独立研究者 Claire Sutherland 在题为《东盟的未来:火药库还是清谈馆?》的论文中评论说,在 2004 年东盟越南峰会上,领导人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加快区域共同市场的建立,并欢呼“东盟+3”是未来亚洲共同体的先驱。该文分析了东盟在东南亚政治景观中的重要性和作为未来变革力量的潜力。还探讨了东盟一体化发生的环境、经济和政治融合是否能明确地结合、东盟能否创造一种不同于欧盟的理解发展和人权的区域认同、消费共同体能否构成务实的区域团结的基础等问题。

印度学者 Rajshekhkar 在题为《亚洲合作对话与亚洲能源合作的机遇和挑战》的论文中,试图探讨关于能源安全与有未来亚洲能源合作可能性的亚洲合作对话成员国的强项与弱点。他认为,文莱、印尼、卡塔尔、菲律宾和中国是亚洲合作对话机制内能源合作的主要推动者。较之东盟的制度架构,通过合作机制,能源安全问题已经在亚洲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能源合作议题上的亚洲合作对话的两个主要推动者——印尼和菲律宾——是东

盟成员国,中国是“东盟+3”架构的成员,其能源安全问题已经在亚洲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他提出,亚洲合作对话的其他成员也与东盟有全面伙伴关系或部分对话伙伴关系,这是否对亚洲能源安全合作机制构成了双重身分的挑战?像蒙古、伊朗等这样的新成员参加进来,对未来亚洲能源合作构成什么样的新挑战?

马来西亚学者 Ellen Huang Palanca 在题为《走向亚洲经济共同体》的论文中提出,“东盟+3”是亚洲经济合作进程的起点,不同的合作形式都在出现。他认为,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对该地区产生了创巨痛深的影响,但人们认识到,金融合作与协调可能是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中比贸易合作更加重要的方面。与此同时,其他不同层面的经济合作安排一直在该地区形成——从全球 WTO 多边谈判安排到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和亚欧会议,还有双边谈判安排。这些安排大多超越了通常的自由贸易协定,属于“新时代”型,即合作是广泛的和综合性的。他指出,正式的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实现面临一些严重障碍,主要是政治上和体制上的障碍。

日本学者 Chi Ming Victor Chan 在题为《亚洲区域治理的新路:从经济推动的区域一体化到危机推动的区域一体化》的论文中,探讨了 20 世纪后期以来亚洲地区治理的变化模式,认为经济独立是亚洲在 APEC 架构下贡献于地区经济项目的主导力量。不过,他也指出,由于国内政治经济难题阻碍该地区的进一步融合,在促进区域治理方面市场引导的自由化成就非常有限。国家体制不能适应这些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危机是标志亚洲在形成地区治理方面的分水岭。他认为,危机不仅使受危机打击的国家与别国因共同威胁和利益走到了一起,也加强了国内治理,尤其是国家体制的能力,以与区域利益保持一致。

### 3. 亚洲区域主义及其动力

韩国学者 Byung-Kook Kim 在题为《比较亚洲区域主义》的论文中提出,区域主义分三种类型:欧盟式的区域主义,它超越民族国家,通过制度化组建一个更大的和平与合作政治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式的全区域贸易联盟,它深化经济合作而无意把协作效果“溢出”来构建单一的区域性政治和安全体制;新的“双边区域主义”,它同时把一个国家与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区捆绑在一起。他认为,亚洲出现了第三类区域主义的扩散。他在论文中分析了中、日、美三角形安全对抗,认为随着中国实力上升为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这种对抗加剧了,而这一推动力量就在第三类区域主义扩散的背后。

中国台湾学者 Pei-Chi Hao 在题为《中国与亚洲区域一体化建设:雁行模式的解体?》的论文中提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地区格局,日本的领导地位已经动摇,区域一体化进程更加复杂。这一变革实际上使飞雁理论面临考验。他认为,中国利用得天独厚的力量和上升优势,重新恢复了足以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亚洲政策。中国开放市场,吸引外资和外商,在谈判中加强其非对称力量,主导了与亚洲国家和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还指出,中国在亚洲产业网络中的作为一个环节的作用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增长和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一变化也可以归功于中国的开放和外向型经济战略,它是一种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制。中国的睦邻政策——包括区域安全政治对话和经济援助政策——将扩大其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影响。由于这些关键性变革,中国已经成为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的积极行为体。

印度学者 Reena Marwah 在题为《南亚地区合作联盟不平等伙伴间的经济合作:回顾与展望》的论文中提出,南亚的区域内贸易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主要原因是广泛的贸易壁垒,根本原因

在于制约贸易规模的各国经济在结构上有非对称性。她认为,南亚小国有必要促进产业发展,丰富产业结构,增强出口能力,以利用印度和整个地区出现的市场机会。从区域内贸易数据和印度与尼泊尔、斯里兰卡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的经验来看,可以认为南亚自由贸易区是走向自由贸易的良好开端,尽管某些条款规定了严格的重新审查。她认为,要尽快实现南亚自由贸易区目标,开展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印度必须发挥关键作用,途径是对南亚的出口产品开放本国市场。除提供资金支持促进贸易和开发能力外,还应该对南亚地区合作联盟中最欠发达国家做最慷慨的让步。为了确保谈判不沦为官僚机构争吵的人质,政治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 4. 中亚地区面临的挑战

印度学者 Umrao Singh 在题为《中亚的权力游戏:初步探析》的论文中认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 5 个中亚民族国家在民族属性上是突厥族,宗教上信奉伊斯兰教,物产方面富有石油和矿产资源,但在经济和政治意义上欠发达。它们缺乏作为有效的现代经济和国家组成部分的公民社会制度、民主和法治。在国内,中亚共和国是脆弱的。在国外,即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方面,看不出明显的敌友界线。俄罗斯和中国出于历史和空间邻近的原因把中亚共和国视为自己的天然势力范围,因此它们试图与这些国家组成联盟,如上海五国(1996 年)和上海合作组织(2001 年)。另一方面,特别是在“9·11”以后,美国一直在向该地区作战略推进,以获取立足点。俄、中、美在中亚进行权力游戏,争取主导地位。

哈萨克斯坦学者 Abdmalik Nysanbaev 在题为《中亚的新地缘政治》的论文中提出,从安全和军事-战略稳定的观点来看,欧盟和欧亚大陆不可能建立一个孤立的军事-政治或地缘政治联盟。显然,问题在于以北约为基础建立由四大要素组成的架

构——它们是美国、欧盟、欧亚大陆、日本。里海-中亚地区发展的基本地缘政治走向明确显示,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这一地区关切到欧亚大陆(进而言之,欧亚大陆-欧洲)地缘政治体系。他认为,中亚和伊斯兰世界仅有很薄弱的文化-历史传统纽带相连。西方与伊斯兰文明日益增加的碰撞也没给这一地区与伊斯兰世界和解或伊斯兰文明向中亚扩展带来机会。此外,伊斯兰教不代表其他地缘政治中心那样的同质和完全的军事-战略构成。从长远看,在独立联合体(CIS)的范围内,有可能创立某种形式的欧亚邦联,由5至10个国家组成,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其中起核心作用。这样,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的最真实和广阔发展方向代表了欧亚大陆向欧洲方向移动。他指出,21世纪中亚地缘政治的召唤就是这些,新世纪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发展战略应当如此。

哈萨克斯坦学者 Rustem Kadyrzhanov 在题为《帝国的影响与中亚后苏维埃时代民族认同的形成》的论文中提出,应当建立统一的理论架构,研究中亚后苏维埃国家民族认同的形成。这一理论基于文化互动理念和帝国的影响。他认为,“当地—俄罗斯—西方—伊斯兰”四边文化结构内的互动模式为人们理解中亚民族认同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地方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天然基础;俄罗斯文化的重要性在于俄罗斯帝国的遗产;西方文化因全球化而形成一种影响;伊斯兰文化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四边结构的四个角相互作用,人们通过观察俄罗斯、西方、伊斯兰和地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可以理解不同中亚国家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他认为,这一理论对后苏维埃认同的整个多样性做了统一的叙述,这一多样性从土库曼斯坦到哈萨克斯坦形成一个统一体。作为一个重要成果,这一理论为中亚民族认同形成的比较研究建立了一个新框架。

## 二、国际关系

### 1. 在克什米尔取得和解：对印、巴、中的含意

印巴两国公开宣布决心相互和解后，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长期争执终于迎来光明前景，与此同时中国和其他国家积极致力于促成即将来到的对话。然而，如何改变现状，尚无现成的具体建议。与会学者探讨了各国对克什米尔冲突的前瞻、涉及和解的无数关注点和促进对话的现实方法。

美国学者 Chitralkha Zutshi 在题为《克什米尔和印度政府：历史、政治与未来可能性》的论文中提出，克什米尔问题的持久解决不仅取决于印巴继续对话，而且同样取决于克什米尔代表与印度政府“持续的接触”并瞩目克什米尔的痛苦。他认为，这将增加克什米尔对印度政府的信心，也是印度获得巴基斯坦信任的唯一途径，这将有助于解开印巴在这一问题上的死结。

巴基斯坦学者 Rifaat Hussain 在题为《解决克什米尔之争：现实主义与正义混合》的论文中指出，克什米尔之争对与解决这一矛盾相关的各方提出了巨大挑战。他认为，约翰·罗尔的“区分原则”是可行解决办法的关键要素。这一视角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必须抛弃以现状为基础的解决办法，换成根本的解决办法，要让克什米尔感受其苦难明显减轻。这就要求印巴在立场上做深刻的再思考，彼此使对方认识到两国都需要携手，改变以克什米尔之争为中心的印巴安全环境。

美国学者袁进冬在题为《中国与克什米尔问题》的论文中，从历史视角分析了中国的克什米尔政策和对印巴和解的评估。他特别关注南亚地缘战略图景的变化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与两个南亚关键行为体关系的演变。他认为，指导中国克什米尔政策的基本原则一直是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印巴之间持久难解的

冲突。无论北京在什么特定时间宣布其立场,都或多或少属于旨在增进中国在南亚次大陆广泛地缘利益的策略。不过,促成印巴和解可能包含北京的重大利益,而潜在的军事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印度学者 Leena Parmar 在题为《战争、和平与解决冲突:克什米尔的一种和平进程文化》的论文中指出,印巴两国都用过教育和媒体来强化相互敌对态度。她认为,通过教育合作,人们可以开始删除教科书中的敌对内容,促进相互理解、友谊与合作,最终通过消除仇恨和冲突要素来加强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只有人民受过教育才能强大。Boniyar 山谷学校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例子,该校的孩子们在战争和暴力中长大,军队和企业在那里倡导和平教育,传达爱、非暴力及和平的信息。政治家的和平努力花钱多,期望大,但在草根阶层并不成功,印巴两国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如同火上浇油。现实是,克什米尔地区的普通男女备加需要和渴望温饱、减贫项目、住房供电、公路和医院。他们更关心子女的未来,而这个学校给了他们一线希望。他们厌倦越境恐怖活动和兵荒马乱。人们有必要从周边人民的视角思考目前的暴力和侵略性安全结构。

### 三、各国外交

#### 1. 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是本次大会讨论较多的主题之一。中国近年来对国际问题采取的积极态度受到一些与会代表的重视,他们引用国际媒体的话形容它为“一种新外交”。但这种新外交是在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展的,中国如何对这一复杂环境做出反应?中国外交政策将怎样影响当今国际“热点”的演变?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采取什么行为模式?国际人士十分关注,拭目以待。与会代表更着



眼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要素、中国新外交的国内根源、中国的多边外交、当前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谈判的原则与技巧等。

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在题为《中国的外交政策——认识的基本因素》的论文中提出,要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首先要观察中国的历史、思想、国际地位、经济发展水平、与大国的关系、地缘政治、国内民族与宗教问题等。他认为,中国外交追求三个基本目标:维护自己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与尊严;为推进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和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和共同发展。关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他认为,中国的立场与发展中国家相同或相近,而与发达国家立场大体上不一致。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西方国家面对共同挑战也有许多合作领域。

中国外交学院郑企荣在题为《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的多边外交》的论文中提出,全球化浪潮中的诸多趋势结合起来,为开展多边外交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应当成为起关键作用的发言者和多边论坛的听讲者,以便在制定和修改国际规则和体制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他认为,中国应当在国际体系中明确自己的立场,积极探索扩大多边外交范围,并加强双边与多边外交活动之间的协调。

中国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崔大伟在题为《中国资源外交政策》的论文中提出,中国外交的新特点之一是资源外交,外资、国外技术等已成为外交核心问题之一。在资源方面,中国的需要对外交影响的方式和程度值得注意,资源与中国崛起的关系以及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的影响值得研究。他指出,中国购买资源,推动经济的影响尤其令美国担忧。中国的资源需要和保护这种需要引起了军事力量的增长。他还认为,中国外交发生了重要转变。20世纪90年代实施走出去战略,由原来的保护性外交转向开拓性外交,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经营。中